

走出传统节约观的迷思
——基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视角的研究

蔡华杰/著

ZOUCHU CHUANTONG JIEYUEGUAN DE MISI
JIYU SHEHUIZHUYI SHENGTAI WENMING SHIJIAO DE YANJIU



人民出版社



走出传统节约观的迷思

——基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视角的研究

蔡华杰/著

ZOUCHU CHUANTONG JIEYUEGUAN DE MISI
JUYU SHEHUIZHUYI SHENGTAI WENMING SHIJIAO DE YANJIU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毕于慧
封面设计：王欢欢
版式设计：董晋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出传统节约观的迷思：基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视角的研究／

蔡华杰 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

ISBN 978-7-01-018599-6

I. ①走… II. ①蔡… III. ①生态环境建设—研究—中国 IV. ①X3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90644 号

走出传统节约观的迷思

ZOUCHU CHUANTONG JIEYUEGUAN DE MISI

——基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视角的研究

蔡华杰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0.25

字数：290 千字

ISBN 978-7-01-018599-6 定价：6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生态文明视野下的节约观研究”（编号：13CKS020）的最终成果

目 录

导 言 反思生态环境问题的“去政治化”阐释	1
-----------------------	---

上篇 稀缺与节约观

——研究起点的反思

第一章 稀缺性假设是怎样炼成的	15
一、稀缺性假设异于古希腊的稀缺思想	16
二、稀缺性假设、雇佣劳动与私有产权	20
三、稀缺性假设、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	24
第二章 “稀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29
一、“稀缺”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范式	29
二、狩猎采集时代的“丰裕”	34
三、资本主义制造“稀缺”	42
四、超越“稀缺”	51
第三章 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下的节约观	60
一、稀缺性假设的缺陷	61
二、从稀缺性假设到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	65
三、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下节约的途径	70

中篇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节约观

——研究范式的转换

第四章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意涵	81
一、资本主义生态文明是一种矛盾修辞	82
二、马克思主义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	97
三、坚持自然资源公有制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	104
四、公平正义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价值取向	111
第五章 在生产中节约还是在消费中节约	128
一、环境修补：生产增长范式对环境问题的回应	129
二、在消费中节约：普林森的消费批判范式	130
三、回到生产批判：以废弃和浪费为例	137
第六章 资本主义农业中的节约及其反思	151
一、资本主义农业是节约人力的农业	152
二、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视角反思资本主义节约型农业	157
三、构建以生态和民生为导向的节约型农业	166

下篇 气候变化与节约观

——重大问题的探讨

第七章 节约型社会视域下气候变化怀疑论批判	179
一、气候变化是关涉节约的重大问题	179
二、气候变化怀疑论及其对节约的影响	183
三、气候变化怀疑论的本质	194
第八章 节能不仅仅是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	207
一、降低能源强度是各国节能政策首选	207
二、杰文斯悖论	216

三、杰文斯悖论在当代	221
四、杰文斯悖论在中国	228
五、走出杰文斯悖论	233
第九章 汽车业节能何以可能	239
一、从自由主义到制度主义	239
二、作为方法论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	245
三、汽车业节能的国别差异：经验分析	250
四、政府与企业的良性互动推动汽车业节能	259
第十章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及其节约机理	263
一、基于私有产权的解决方案及其节约机理	263
二、基于公有产权的解决方案及其节约成效	271
三、健全我国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280
结 语 走出传统节约观的迷思	293
附 录 互联网 + 环境保护 = ?	297
主要参考文献	301
后 记	315

导言 反思生态环境问题的 “去政治化”阐释

只有某种理论方法不断为其他理论方法所替代，科学方能够获致进步。

—— [美] 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

毫无疑问，我国在过去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中，已然面临着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难题，这一难题对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人民群众的幸福安康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节约资源的意义无需赘述，问题或许可以直接简化为如何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更好地做到资源节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日益成为各个学科关注的焦点之一。“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大胆涉足其自身领域之外的学者将很快被告知，他的观点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新颖而富有创造性。”^①哈丁的告诫提醒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在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内进行研究，我是这么做的，也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可以对此课题做出自己的创造性解答。

还是先从人们关心的空气质量讲起。由于空气质量直接关涉公众的生命健康，因此自然而然成为当今中国生态环境的焦点问题之一，尽管

^① [美] 加勒特·哈丁：《对〈公地的悲剧〉一文的再思考》，载 [美] 赫尔曼·戴利、肯尼思·汤森主编：《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马杰等译，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 167 页。

如此，或许是因为 PM 2.5 这一词语的“流行”以及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空气质量以及“雾霾”也才于 2011 年左右真正进入公众的视野。作为职业习惯，阅读每日报纸和新闻网页成为笔者日常的“餐食”之一，久而久之，在报纸和网页大量有关雾霾的报道中，似乎有一种难以言明的“东西”一直映入我的眼帘并萦绕在我的心头。为了找出这种难以言明的东西，笔者搜索了 2011 年以来雾霾发生时各新闻媒体超过二百篇的相关报道，终于找到了这种“东西”，即在驱除雾霾上形成了某种“共识”——要驱逐雾霾必须“等风来”。许多新闻媒体使用了类似这样的标题：“雾霾天被北风吹散”、“现阶段消除雾霾只能等刮风”、“冷空气吹散雾霾现阳光”。笔者并不是要否定新闻媒体的报道，从气象学的角度看，雾霾的驱除确实需要冷空气的来袭，新闻媒体的报道无可厚非，但每次雾霾来袭，媒体都从这一角度进行报道容易导致大众形成对“风”依赖的感知心理，进一步思考，这种心理会造成这样一种逻辑：空气污染是个自然问题，解决空气污染问题也可以靠自然的力量，从而忽视产生和解决问题的非自然因素。由此一来，推广到其他生态环境问题，就会导致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的“去政治化”（apolitical）倾向。

从内涵上看，“去政治化”意味着在政治价值立场上的“中性化”，在研究取向上对意识形态的“淡化”。就生态环境问题而言，“去政治化”阐释就表现为，在面对生态危机时，主张针对生态环境问题本身展开叙事而尽量回避或有意忽视与之相关的政治价值立场和意识形态性。生态环境问题因其首先表征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更容易在研究上陷入“去政治化”的陷阱。在国内，有学者认为，“生态环境危机的发生与基本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眼下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消耗、污染物的大量排放、全球性资源的严重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日趋加重，除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的双重压力外，主要与人类传统、落伍的发展观密切相关。”^① 还

① 关志钢、黄频：《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评析》，载李惠斌等主编：《生态文明与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6 页。

有的学者指出,“生态危机是一个世界性问题,直接原因是现代生产力发展导致的对自然巨大的获取和破坏能力,与资本逻辑和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用资本逻辑和社会制度不同不能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①在国外,“生态稀缺论”和“生态现代化”话语就是生态环境问题“去政治化”的理论表现。

长期以来,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叙事都绕不开“稀缺”二字,因为无论是从量上看还是从质上看,自然资源的供给已经呈现出一种无法满足人类的现实所需的危急状态,从而自然资源就被扣上“稀缺”的帽子,也就有了所谓的“生态稀缺论”。对此,典型的论调主要有两个:

一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生态稀缺观。这种观点把自然资源视为生态环境问题的“原罪”,即自然条件的“稀缺”本性决定了人类必定要遭遇生态危机的“宿命”。水资源的短缺、肥沃土地的缺乏、森林植被的减少都对人类的生存、生产构成了资源瓶颈。新古典主义就是以此为出发点来界定经济学的涵义,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认为,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②。这里的稀缺手段当然包括自然资源的稀缺,也正是因为如此,汤姆·蒂坦伯格(Tom Tietenberg)在《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一书中就指出了经济学的功用:“经济学分析提供了极其有效的一系列工具,可以帮助对理解和/或调整人类行为感兴趣的任何人,特别是在稀缺性存在时。”^③

二是马尔萨斯和新马尔萨斯主义的生态稀缺观。这种观点把人口数量视为生态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即不断增长的人口对“稀缺”的自然资

① 顾钰民:《生态危机根源与治理的马克思主义观》,《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年第1期。

② [英]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朱泱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0页。

③ [美]汤姆·蒂坦伯格、琳恩·刘易斯:《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王晓霞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源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1789年，马尔萨斯在其《人口原理》中就曾直言不讳道：“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懂得一点算术的人都知道，同后者相比，前者的力量多么巨大。”^①进入20世纪，继承马尔萨斯衣钵的有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的“人口大爆炸”、肯尼斯·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的“宇宙飞船地球”和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他们同样强调了人口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其他的学者尽管不从人口问题出发，但秉承了马尔萨斯的要义，以“熵定律”为基础探讨不可避免的自然极限，代表人物是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和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熵定律”表明，在自然过程中，一个孤立系统的总混乱度（即“熵”）不会减小，据此，罗根认为，经济过程输入的是有价值的自然资源，而输出的却是毫无价值的废物，即物质和能量以低熵的状态进入经济过程，却以高熵状态出来，所以，“环境中低熵比李嘉图的土地更稀缺。”^②里夫金主张，人们的世界观应该从机械论世界观向熵的世界观转变，“机械论世界观以持久的物质增长为出发点，而熵的世界观则以保存有限资源为思想基础”^③。

尽管两种论调的出发点不尽相同，前者强调了自然资源“稀缺”的天然性，后者是在与人口数量的比较中凸显了自然资源的“稀缺”，但它们都认为自然条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构成某种限制，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可避免的一条永恒规律。

与生态稀缺论的悲观论调不同，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是当前有关环

① [英]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页。

② [美] 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熵定律和经济问题》，载[美] 赫尔曼·E. 戴利、肯尼思·N. 汤森主编：《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马杰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93页。

③ [美] 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吕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67页。

境变革的主导性理论之一，其在反思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不可兼容的理论假设基础上，将实现现代化和生态化的双赢作为自身的理论旨趣和现实目标，并且得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各种经济组织的支持。生态现代化将生态环境问题归因为“现代”的科学技术和市场化机制的应用不足，因此，重要的是研发并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治理生态环境问题，从技术上预防生态环境问题的发生或者修复已经遭受破坏的环境，同样重要的是必须将自然资源纳入市场化的范畴，重新赋予自然资源以货币价值，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配置自然资源，以达到自然资源的高效利用。由此一来，人类社会必将克服生态环境的局限，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局面。简单地说，生态现代化的核心构成要素是推崇在环境治理上的技术化路径和市场化路径的解决办法。

从表面上看，生态稀缺论和生态现代化话语都具有很高的正确性，它们揭示了人类在与自然相互作用进程中所获得的感知，但是，它们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着力点，把人视为抽象的简单总体，谈论与自然的关系，这就忽视了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和一定历史条件下具体的、复杂的复合体，对具体的、社会历史性的人及其环境影响的忽视，也就回避了生态环境问题与政治价值立场、阶级利益、权力关系等的相关性，从而表现为一种“去政治化”的阐释。这样一来，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追问：自然资源就是天然地呈现稀缺性吗？是人口的过快增长导致了自然资源的稀缺？在人口结构中，哪部分人口构成了过剩人口？是他们对自然资源造成了压力？环境破坏严重的地区是先进科学技术应用不足和市场化程度不够的问题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更清晰地看清“去政治化”阐释的本质。

生态稀缺论企图将“稀缺”视为超越任何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永恒化议题，把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固定化”，把人口的过快增长“妖魔化”，既不联系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追问“稀缺”的真正根源何在，也不追问不同国家的人口、同一国家不同人群对生态环境的威胁程度有何不同。就前者而言，稀缺并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而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历史现

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要求不断增殖的本性才导致了自然资源的稀缺,因而,稀缺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①;就后者而言,从不同国家的人口消耗情况看,显然发达国家对自然资源的人均消耗量要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从同一国家的不同人群看,收入不同的群体对环境的影响也是不同的^②。生态现代化看到了科学技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作用,因此将生态环境问题归因为有害技术的过多应用和有益技术的应用不足,有一定的合理性。生态现代化还将人类之前占有的自然资源从免费占有转变为付费使用,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生态现代化其实采取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生态稀缺论和生态现代化是相互联系的,“稀缺”的存在要求开发新技术以克服稀缺,但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有可能引起新的稀缺,从而陷入一种循环论证的歧途,正如迈克尔·佩雷尔曼(Michael Perelman)所说:“‘稀缺性’‘短缺’‘衰退’等词语将唤起技术需求的图景。它们将告诉我们,只有当更多的石油或者更好的利用资源的方法可以得到时,经济问题才会消失。这种看法只会导致循环论证。每一种新技术都是紧跟着新问题、对更先进的技术的需求而来的。”^③总而言之,生态稀缺论和生态现代化只看到生态环境问题的浅层原因,而不深究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因此带有明显的“去政治化”色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二者存在着其不敢也不愿触碰的致命瓶颈,即它的意识形态定位是以不触动资本主义体系为前提的,它既不考察科学技术产生的政治经济背景,也不追问特定社会关系下技术应用的适应性问题及其后果,更不深究市场化机制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全面渗透和全球性扩张背后的阶级冲突,从而陷入技术和市场崇拜的迷思之中,而忽视对资本主义进行结构性

① 对此,笔者另文做了详细的阐述,详见《“稀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一章。

② 例如,有学者研究了上海家庭不同收入人群的生态足迹: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水平家庭的平均生态足迹分别为4.74、7.94、20.69公顷,高收入家庭是低收入家庭的4.4倍。参见李定邦、金艳:《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家庭资源消费可持续性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③ [美]迈克尔·佩雷尔曼:《马克思和资源稀缺》,载[英]特德·本顿:《生态马克思主义》,曹荣湘、李继龙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4页。

重大变革的要求。

但生态稀缺论和生态现代化为何要淡化或回避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价值立场和意识形态性呢？那是因为“去政治化”本身也是一种“政治”，都秉持着一定的政治价值立场和意识形态取向。马尔萨斯从其人口原理出发，指责人口过剩对生态环境的压力，而哪些人口构成了过剩人口呢？自然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口。他还提出了采用贫困的积极抑制的解决办法，而这一方法则适用于穷人和下层阶级，“所谓积极的抑制，是指已经开始增长的人口所受到的抑制，主要是（尽管也许不完全是）最下层社会所受到的抑制”^①。因此，他反对对穷人的救济和施舍，反对英国政府颁布的《济贫法》，在这里，他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企图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进行辩护，企图固化不同人口的阶级地位，并将资本主义永恒化。

生态现代化认定“现代”的科学技术和市场化机制是治愈生态危机的良方，那么，哪些地区尚未采用这样的良方呢？在全球范围内，自然是那些在经济意义上落后的原住民地区和落后国家，由此，某些国家和跨国资本家集团举着生态化和现代化的旗帜，逐步打开了推广所谓绿色化技术和市场化机制的“潘多拉魔盒”。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打着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幌子，以农业的化学化和工厂化为主要特征的所谓“绿色革命”的推广，近二十年又是打着解决世界粮食危机的幌子，以技术进步的名义兜售饱受争议的转基因育种技术，与此相伴随的是对土地、野生动物、森林资源、水资源等自然资源的商品化、全盘私有化处置以及贸易的彻底自由化，其结果非但没给原住民地区和第三世界国家带来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反而引发了这些地区和国家环境资源的贴现、生态系统的几近崩溃以及动荡不安的社会秩序，而从中获利的则是参与其中的跨国资本家以及资产阶级国家，在这一进程中，不仅跨国资本家获取了丰厚的利润，而且维持并巩固了已经存在的“中心—边缘”式的资本主义主

^① [英]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8页。

导的世界体系。

反思生态环境问题的“去政治化”阐释，就要求我们对生态环境问题进行“政治化”阐释，因此，作为一种分析框架的“政治生态学”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有用的。政治生态学是一种将生态学与政治经济学融合起来的方法论，其“生态”意涵在于，它吸收了生态学的基本知识，承认生态系统自身的生态承载能力，并构成了人类生产的绝对约束。其“政治”意涵在于，生态系统又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建构的产物，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逐步打破生态系统的绝对约束，并伴随着自然资源所有权的变化所引起的财富和权力的生产与分配，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态环境变化的受益者和受损者的阶级分化。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对生态环境问题进行考察的中心问题在于：人类怎样改造生态系统以获取自身所需要的物品和服务，又是怎样创制政治经济制度来管理这些物品和服务的再生产和分配。

从当前的现实语境看，政治生态学就是要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改造生态系统获取物品与服务的形式，以及如何维持这种获取的自然条件前提和劳动力前提，从而再生产出自然条件和劳动力，就是要考察在这一进程中所造成的生态后果和社会后果，以及寻求以社会主义和生态文明为导向的结构性生态政治变革。

由此一来，对资本主义作出科学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而然成为本书重要的思想武器，而以此为出发点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术语，则成为本书独特的视角。笔者从一开始就坚信，“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视角下的思考将为我们反思传统的节约观，构建新的节约观提供更多的想象和研讨空间。从结构上看，除了附录部分是笔者对“互联网+”的环境效应的断想，可以算做番外篇，本书由三个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稀缺与节约观、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节约观、气候变化与节约观。上篇是笔者对研究起点的反思，前续上篇的反思，在中篇进行研究范式的转换，最后，在下篇对气候变化这一重大问题进行探讨。本书的研究框架和内容可以用图0.1表示。

上篇是“稀缺与节约观”。因为稀缺，所以节约。就此，笔者从审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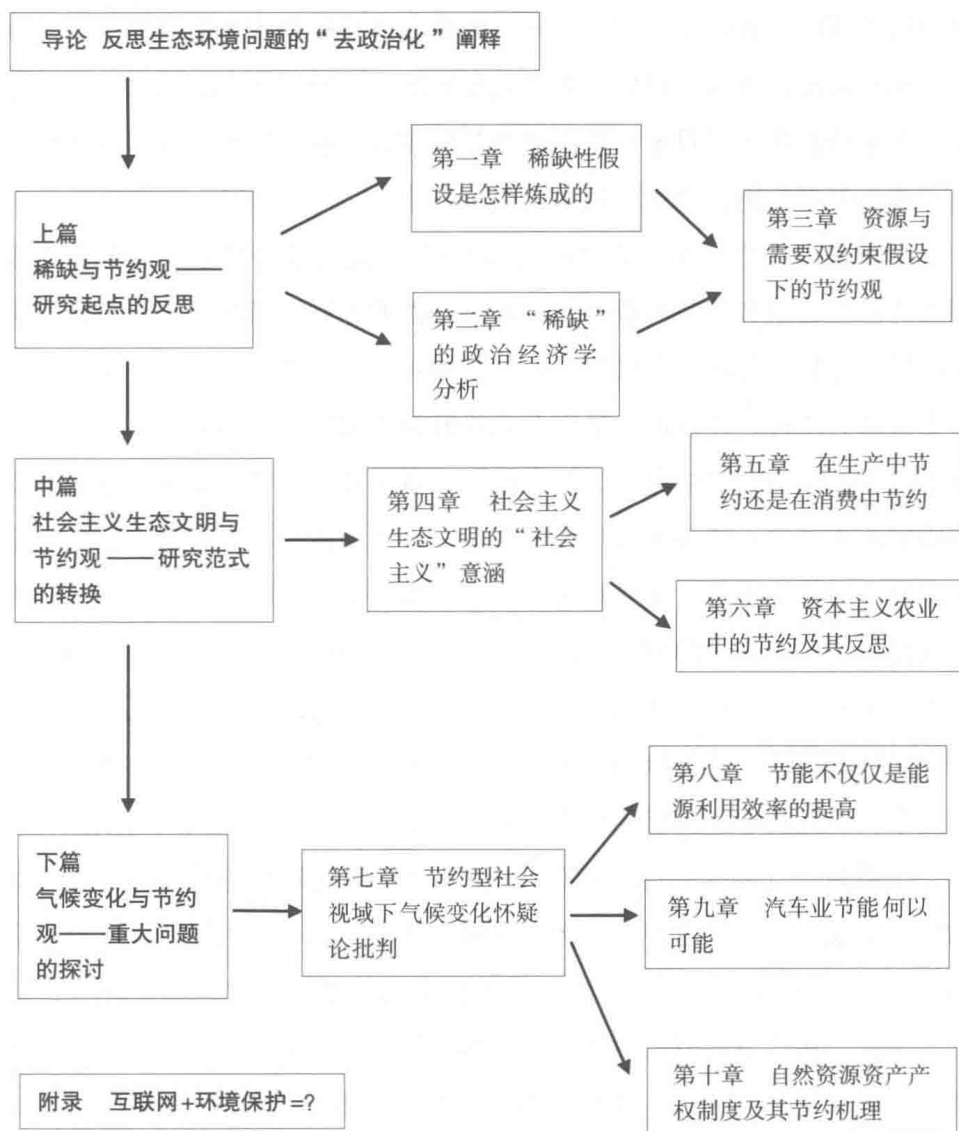


图 0.1 本书的研究框架和内容

稀缺思想入手，在对思想史进行考察的过程中，指出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稀缺作出普遍性或普世性提升的稀缺性假设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获得上起到了基础性作用。由此一来，能否从稀缺性假设引申出科学的节约观就值得怀疑。进而，笔者对稀缺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把不同社会形态生产方式的考察吸纳进来，从而认识稀缺产生的真正原因以及如何超越稀缺。在批判性吸收稀缺性假设的基础上，笔者研究了在资源和需要双约

束假设下所应具有节约观，即一方面要通过科技和市场机制的手段高效利用和优化配置资源，以较少和优化配置的资源产出较多的商品，另一方面又要重视控制生产总量和生产高质量的商品，通过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增强有效需求或消费能力。

中篇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节约观”。通过前一部分的研究，笔者洞悉资源的稀缺和浪费与资本主义有根本性的关联，因此，要在未来生态文明形态下树立科学的节约观，首先必须对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意涵有更清晰的阐释，并以此为基础开启研究范式的转换，为此，笔者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意涵”一章论述了“社会主义”这一重要前缀的四重意蕴：资本主义生态文明是一种矛盾修辞，马克思主义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坚持自然资源公有制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公平正义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价值取向。在随后的两章“在生产中节约还是在消费中节约”、“资本主义农业中的节约及其反思”中，笔者又前续“社会主义”的意涵，具体例举分析了在社会主义导向下生产节约与消费节约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农业生产过程中所取得的节约成效及其局限。

下篇是“气候变化与节约观”。在完成对研究起点的反思和研究范式的转换的前提下，笔者着重对当今的重大环境问题——气候变化以及与之相关的节约问题展开研究。首先需要澄清的问题是到底存不存在气候变化，为此，在“节约型社会视域下气候变化怀疑论批判”一章中，笔者在概述气候变化怀疑论后，指出气候变化怀疑论在科学维度上的反科学性，在政治维度上的资本主义属性。缓解气候变化需要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而节约化石燃料的使用是根本之策，节能成为各国政策的必然性选择，因此，什么是节能？何以节能？在随后的三章“节能不仅仅是能源效率的提高”、“汽车业节能何以可能”、“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及其节约机理”中，笔者对此进行了讨论。

因而，如果读者想从本书中获悉怎样节约的具有操作性的具体细节，或者说，取得某种“节约真经”或“节约术”，恐怕要令其失望了，本书的目标并不在于提供节约的具体做法，或构建“怎样节约”的系统性工程